



二零一二年九月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
香港新界沙田澤祥街十二號鄭裕彤樓十三樓

鳴謝



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衷心感謝以下捐助人及機構的慷慨捐贈
及對我們的支持 (以英文字母順序)：

捐助人	捐助機構
查懋德	北山堂基金
鄭海泉	銀聯集團
周松崗	國家開發銀行
方方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馮國經	東亞銀行
胡祖六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劉遵義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李國寶	
黃桂林	



王道文化與經濟制度¹

劉遵義² 與 殷壽鏞^{3,4}

2012年9月

摘要

王道文化是泛指儒家認為君主統治應該施行仁政的思想，而仁政意則是以道德與仁義為基礎，來貫徹治國之理念。因此當國家在執政者的帶領之下，能夠體諒人民，以人民為本，使人民溫飽之餘，更思考如何教化人民，改變人民的價值觀，使人民不再單以自身利益為優先考量，而考量整體的長遠利益，這乃是整個儒家經濟思想的精神所在。可是在王道文化之下，從生產到消費，都有外部性，單靠市場機制，就不能保證整體經濟能夠達到最高的效率。因此市場機制與政府監管，如同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必須手攜手合作才能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益。要推行王道文化，需要從改變整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做起。

¹ 本文將出版於劉兆玄與李誠(主編)，《王道文化與公義社會》，臺北：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與遠流出版公司聯合出版，2012年9月。

² 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及史丹福大學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榮休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並不必然反映與作者相關的各機構的觀點。

³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博士研究生。

⁴ 作者感謝李誠教授與劉麥嘉軒女士的評論與鼓勵，但所有剩餘的錯誤，仍由作者自己負責。

1. 引言

王道一詞最早出現在《尚書·洪範》中，在中華文化裡，王道泛指儒家認為君主統治應該施行仁政的思想，而仁政意則是以道德與仁義為基礎，來貫徹治國之理念。王道在政治方面的意義，基本上可以說是實行以德服人的策略。《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 (Plato)，也曾在它的《共和國 (The Republic)》書中，提出「哲者為王」的概念⁵，而這些哲者國王會教化他們的人民，從而推動他們的理想，基本上也可以說是在實行提升文化與道德水平的策略來治國。

儒家強調自我道德修養，且強調道德修養對於治國的重要性；《中庸》也提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所以執政者需要懂得如何修身才能施行仁政。《孟子·梁惠王上》：「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也強調了仁義之重要性，若義利不分，則恐為暴政之源，所以儒家王道文化之主旨，就是闡明在上位者必須施行仁政。

然而在《論語·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則點明了孔子施政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以民為本：人民能溫飽，政府有充足的兵力來捍衛百姓，自然會得到人民的信任。孔子重視物質民生問題，反觀《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從國家的角度來談利益的問題，卻明顯地主張仁義應放在第一位，而利益在其後，其差異可能在於孟子所處時代的經濟狀況，要比孔子所處時代

⁵ “Philosophers [must] become kings...or those now called kings [must]...genuinely and adequately philosophize” (Plato, The Republ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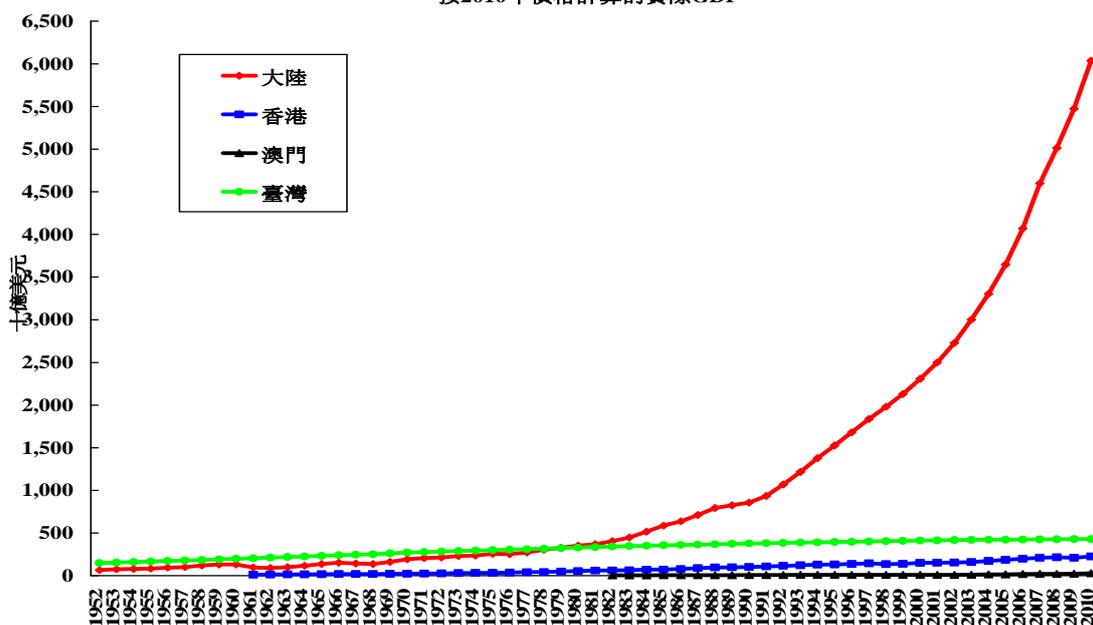
好，也因此孔子需要更優先考慮人民溫飽安全等民生問題。不單是孔子，在更早之前，管仲也說過《管子·牧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明白地指出了物質生活與禮義道德和社會安定之間的關係；《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庶、富、教以及其優先順序，即為孔子治國之中心思想。

2. 大中華地區兩岸四地的經濟發展

人民平均所得，是現代經濟學用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標。綜觀過去 60 年，大中華地區兩岸四地，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以及台灣的經濟概況，都先後有非常迅速的增長。至 2010 年，中國大陸的境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了 6 萬億美元，而台灣與香港的境內生產總值，也都分別達到 4 千 7 百億與 2 千 2 百 50 億美元上下。圖一分別將過去 60 年的實際生產總值（以 2010 年價格計算）圖形呈現，可以發現在中國大陸在 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前，台灣境內生產總值的上升幅度，是高於中國大陸的；但相對地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境內生產總值在近 30 年有了顯著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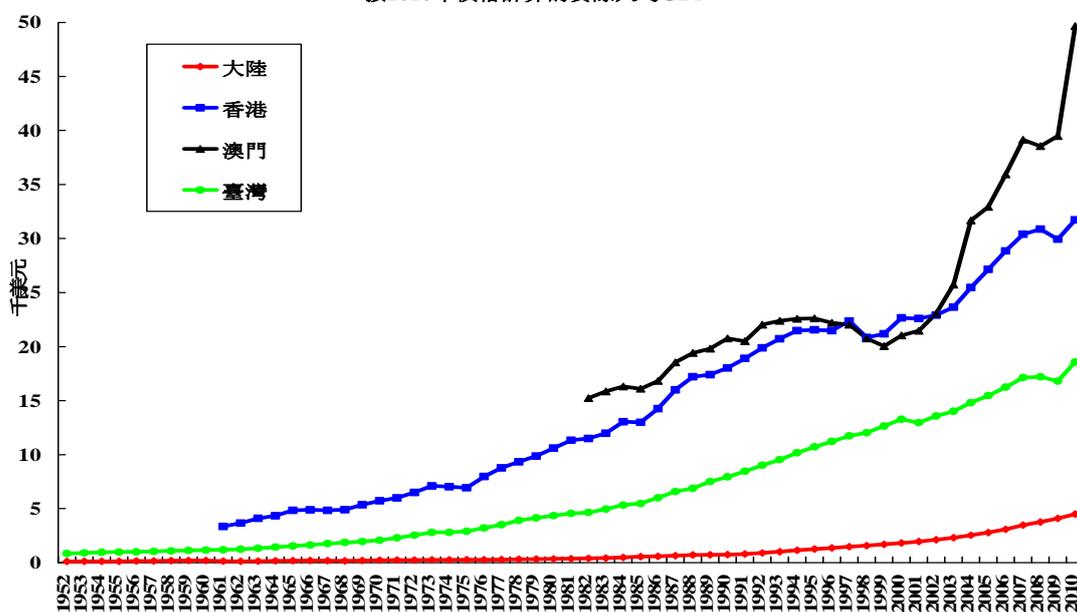
圖二則分別將四地的人均所得的成長趨勢畫出，可以發現這四個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各個政府的改革與努力下，都呈現了改善，雖然是不同程度的改善。人均所得以澳門為最高，超過了 4 萬 9 千美元，甚至超越了美國；其次是香港，超過 3 萬 1 千美元；而台灣也達到了 2 萬 1 千 7 百美元；在兩岸四地中，中國大陸的 4 千 5 百美元人均所得，雖是敬陪末座，但以全球角度而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 年所估計的人均所得排名，也在前 100 名中，可以說是小康的水平；而大陸同胞的溫飽問題，也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

按2010年價格計算的實際GDP



圖一

按2010年價格計算的實際人均GDP



圖二

回顧孟子的理論，則主要是針對當時社會只注重個體或個人私利的傾向，《孟子·梁惠王上》就曾說到：「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所以在現今無論開發中或已開發的國家，

孟子所云之王道精神，更需要引申為戒，避免凡事都以利益來衡量，都以利為先；在人民基本溫飽後，執政者更應當考慮重整與重建社會的核心價值。其實兩岸四地都早已經達到或超過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時候了。

3. 王道文化的經濟內涵

王道文化的經濟內涵，基本上也可以以《禮記·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作為最佳闡述。孔子曾為魯國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大治，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之德政，達到大同盛世的境界。這乃是由於孔子教化魯國人民的成功，而並不是嚴厲執法的結果。《禮運大同篇》包含了幾個重要的基本經濟概念，我們在下面一一解釋。

3.1 個人利益與集體福利

「天下為公」的意義，就是說：天下不是為一人或一家所擁有，也不是只為一人或一家所服務，所以執政者追求的是集體福利和利益。「講信修睦」的意義，就是說：講求誠信，培養社會和諧。要達到社會和諧，也就需要兼顧集體的福利和利益，減少或消除人民內部的矛盾。重點是不單執政者需要謀求集體的福利和利益，一般人民也應當自發性地考慮到其他人的利益。

3.2 個人效用函數（價值觀念）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就意味着個人不單照顧自己的父母與子

女，也照顧他人的父母與子女。「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也就意味着個人出力，不必只是爲自己的利益。用現代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就是個人的效用函數 (utility function)，不單取決於個人自己與家人的商品(包括休閒 (leisure))與服務的消費量向量 (vector)，也取決於其他人的商品與服務的消費量向量。《論語·顏淵》：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強調考慮其他人的利益與感受的重要性。

在現代經濟學中，個人的效用函數可以寫成：

$U = F(X)$ ，其中 U 是個人的效用函數值， $F(\cdot)$ 是效用函數， X 是個人自己與家人的商品與服務的消費量向量。但假如個人的效用函數，也同時取決於其他人的商品與服務的消費量向量時，個人的效用函數就可以寫成：

$U_0 = F(X_0, X_1, X_2, \dots, X_n)$ ，其中 X_0 是0個人自己與家人的商品與服務的消費量向量； X_i 是 i 個人與家人的商品與服務的消費量向量， $i=1, \dots, n$ 。0個人的效用也取決於其他人的消費量，其他個人的效用亦然。0個人對不是家人的其他人，張三、李四或王五，都是一視同仁，所以0個人的效用值應當是獨立於其他人的數標 i ，也就是說：

$$\begin{aligned} U_0 &= F(X_0, X_1, X_2, \dots, X_n), \text{也等於} \\ &= F(X_0, X_2, X_3, \dots, X_n, X_1); \end{aligned}$$

0個人的效用值不受其他人互相交換他們消費量所影響。其實，0個人的效用函數，除了取決於自己與家人的消費量向量外，也可以只取決於其他人的效用函數值，而不是直接取決於其他人的詳細消費量向量，在這種情況之下，0個人的效用函數也可以寫成：

$$\begin{aligned} U_0 &= F(X_0, U_1(X_1), U_2(X_2), \dots, U_n(X_n)), \text{其中} U_i \text{是} i \text{個人的效用函數；同時} 0 \\ &\text{個人的效用函數，也是獨立於數標} i, \text{就是說：} \\ &= F(X_0, U_2(X_2), U_3(X_3), \dots, U_n(X_n), U_1(X_1))。 \end{aligned}$$

0個人的效用函數值會隨着其他人效用函數值增加而增加，但無論任何其他人的效用函數值增加，對0個人的效用函數值的影響都會是一樣的。

假使個人不是完全自私的，而個人的效用函數也真正取決於其他人的效用函數值或商品與服務的消費量向量，這就形成所謂外部效應 (externality)；個人的效用函數值，不單取決於自己的行為，也取決於其他人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個人各自獨立尋求自己的效用函數最優化，並不能保證達到整體經濟的最高效率或是柏拉圖最優 (efficiency or Pareto optimality)。在有外部效應情況下，要達到整體經濟最高效率，不能只倚賴市場運作，市場之外的直接協調 (coordination) 是必須的。

例子：有一對夫婦，家境清貧，但非常相愛。先生很喜歡攝影，有一個照相機；夫人有一頭美麗的長頭髮。節日到了，兩人都想買禮物送給對方，但都沒有錢。先生把照相機賣掉，買了一個梳子，準備送給夫人用來梳她的美麗的長頭髮。夫人剪了她一頭美麗的長頭髮，賣了給別人，再買了一個鏡頭，準備送給先生用來攝影。結果是兩人都不能使用對方辛辛苦苦買來的禮物，而處境比以前更差。兩人的動機都非常好，都是想令對方高興，但結果卻適得其反。這個簡單的例子，就說明了在有外部效應的情況下，協調是何其重要。

當一個社會中個人作決策時，會考慮到其他人的利益，也會受其他人的行為所影響，這個人的行為就會產生外部效應；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每個個人都追求個人效用極大化，但缺乏協調，也不能保證整體經濟達到最高的效率。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也包含了兩個重要的概念：首先，超富足 (super-abundance) 的物質經濟水平還未達到，所以仍然需要珍惜資源，不能讓財貨隨便丟棄於地上。其次，即是如此，也不必把財貨藏於己身，因為個人自己的基本需要不大，個人效用函數裡個人消費量的邊際效用下降迅速，個人很容易就幾乎可以達到完全滿足 (satiation)，而把財貨給其他有需要的人分享更為重要。

最後，個人效用函數也應當取決於不僅是現時，也包括將來的個人與其他人的商品與服務的消費量向量(或其他人的現時與將來的效用函數值)。而在個人效用函數裡，現時與將來的個人消費量，也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個人所需要考慮的問題，所需要作出的決定就是：假如五年後能多吃一碗飯，值不值得今天少吃半碗飯？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時間優先選擇率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的考慮。

所以個人效用函數也可以再寫成：

$U_0 = F(X_{01}, X_{02}, \dots, X_{0T}; U_{11}, U_{12}, \dots; U_{21}, \dots, U_{nT})$ ，其中 X_{0t} 個人自己與家人在 t 時期的商品與服務消費量的向量； U_{it} 個人在 t 時期的效用函數值； T 是 0 個人計畫時期的總上限；同時 0 個人的效用函數值，也是獨立於數標 i 的。假如個人效用函數是有這種形式，那末個人在考慮作出決定時，就需要考量個人與其他人的利益，也需要平衡短期與長期的利益，這樣就不會作出太自私和太短線的決定。

3.3 集體福利與社會安全保障

大道之行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重點在開頭的這個「使」字，就是說：這些目標最終都是執政者(與社會)的責任。「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就是說：所有的弱勢社群，所有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人民，都能獲得應有的生活照顧與保障；國家需要有一個有效的社會安全網。「壯有所用」就是說：所有成年人都能對社會作出貢獻，都會有有意義的工作機會；執政者的責任，就是要維持全民就業 (full employment)。與此同時，「男有分，女有歸」也就是說：所有人民都能積極參與社會，都能有一個夫妻互相關顧的家庭，而執政者也有促進成年男女成家的責任。這樣一來，所有人民的基本需要都能夠獲得到滿足。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目標亦都符合現代的社會公義。

3.4 小結

在經濟領域推廣儒家的王道文化，就是要改變人民的個人效用函數，希望他們不光是考慮自己或家人的利益，也考慮其他人的利益，也希望他們不要太斤斤計較物質的消費與享受，不要太偏重短期的得失，而也要考慮長遠的利益，也要關注到還未出生的世代的持續生存。個人效用函數是內在的，對約束個人的行為，比外部的守則與法律更為有效。

近年來，從個人到社會，價值觀開始朝着唯己化，功利化與勢利化的方向演變；只求利己，不怕損人，已成為一種普遍的風氣，不但影響了社會的和諧，也是人民內部矛盾增加的主要原因。這個趨向，也表示在個人效用函數裡，已經沒有其他人的因素。可見得個人主義與唯己化的發展，是和王道文化背道而馳的。經濟學泰斗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在他的書中⁶，也曾提出個人對其他人的福祉應有的關注。

4. 王道文化與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機制具有的優點，就是能夠讓整體經濟達到最高的效率。但它也必須滿足一些特定的條件，例如具有真正的公平競爭性，信息要正確實時，市場買賣雙方信息都要對稱，參與者可以自由進入與退出市場，生產與消費都沒有外部效應等等，才能達到經濟效率最高的結果。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 1894 年上李鴻章的萬言書裡，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構想，這也正是現代經濟學整體經濟達到最高效率的標準。但即使整個經濟體

⁶ “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s of others, 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裡完全沒有外部效應，市場機制本身也並不能確保這些特定條件能夠自動與及時滿足。因此，政府的監督和管理，對於市場經濟來說，是非常必要的，例如應當有反壟斷法與公平競爭法。

4.1 品牌與品質

市場經濟的一個特點，是無名性 (anonymity)；買方與賣方通常都是短暫地一次性的接觸。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很容易產生欺詐的行為。「講信修睦」就是講求信用，培養和諧；就是要賣方做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假使賣方能夠考慮到它本身的長期利益，就會希望與買方有重複的、多次性的交易，也就自然不會採取欺詐的手段，賣方也會有意願去建立自己的品牌；既然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也就會盡力去保護它，不會做任何會損壞自己品牌、自己聲譽的事。

在這一方面，政府能扮演什麼角色？政府可以利用它獨有的公信力，提供檢驗與證明的服務，和嚴禁假冒，並保護品牌擁有者的智慧財產權。這些都是一般商業機構做不到或不適宜做的事。

品質自古以來也是社會大眾所重視的問題，在《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提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則就說明品質與貨真價實的重要性。由中國大陸的黑心奶粉事件與台灣的塑化劑事件，都可以看到當品質出事時，對於人民健康，對於社會經濟，對於政府的公信力，都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而政府的法規往往由於制定寬鬆或是不合時宜，並沒有發生實際效用。在這種事件中，需要的是有公信力的檢驗與證明，一般只能靠政府來提供。但在政府努力之餘，還是必須靠教化的方式來改變價值觀，提升道德觀念，從而減少這類違法的行為。

4.2 壟斷市場的誘惑

對一個參與市場的供應者來說，把它利潤極大化的最佳策略，並不一定是與其它供應者(公平)競爭，而是試圖把市場壟斷起來，或是勾結其它的供應者，或分割市場，或聯手抬價，以減少競爭，增加利潤。但操縱或壟斷市場的行為，絕對是違背廣大消費者利益的。

壟斷一詞曾出現在《孟子·公孫丑下》：「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其原意在於有一人企圖操縱市場而從中獲益，雖與現今社會通用的壟斷一詞，意義有所不同，但可見孟子對於左右市場而從中獲利的人士，相當不以爲然，且認爲應當對這樣的行為以稅法來規範。回到現今的角度，在全球化趨勢之下，企業面對激烈的競爭環境，莫不尋求各種方式以提昇自己的競爭能力，包括獨佔或壟斷市場的行為，以及其它不公平的競爭手段。所以政府必須有反壟斷法與公平競爭法，嚴格監管市場參與者的行為，維持市場的開放性與競爭性，讓市場機制能發揮它的作用。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立法支持市場公平競爭（「反托拉斯」）的國家，其「修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乃於公元 1890 年立法，其後於 1914 年再制定「克萊頓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其中定義了托拉斯行為是任何以契約、信託或其他方式所形成之聯合或共謀行為，具有限制或損害州際或與外國間之貿易與商業者之權益。反托拉斯法最主要的目的，在維持市場的公開與公平競爭機制。美國的反托拉斯法重點在於嚇阻的功能，因此其刑事上的處罰極重，且有三倍裁罰的規定。

反托拉斯法相對於台灣的法例則為「公平交易法」，台灣公平交易法乃參考國外之經濟法而定的，如美國之反托拉斯法、英國之獨佔及限制行為法、西德之競爭限制禁止法、日本之獨佔禁止法等。台灣的公平交易法於 1992 年開始實施，此法規範產業界濫用獨佔地位、利用結合及聯合手段壟斷市場、以不公平的競爭手段維持或增加市場佔有率及利潤等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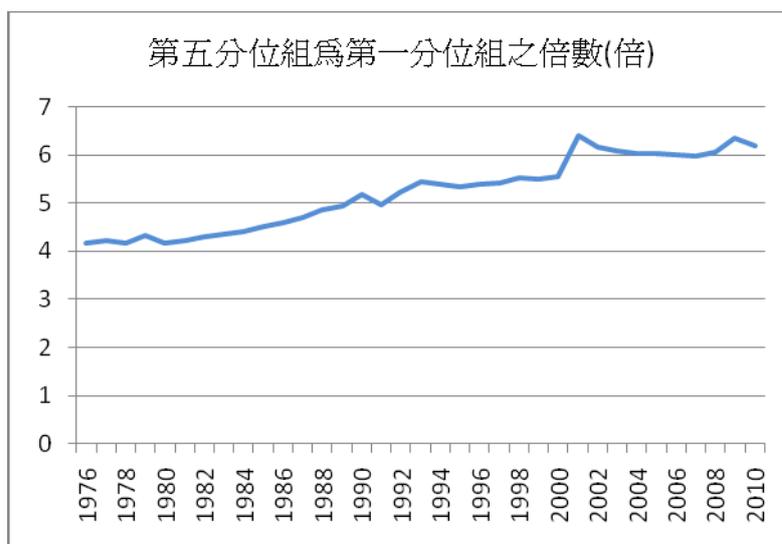
政府的介入，對節制意圖操縱或壟斷市場的行為，可能有一定的成效，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王道文化的精神，透過教育，透過移風換俗，改變每個人的社會基本價值，改變每個人的效用函數，從而將這樣的行為降至最少，以維持社會的長期和諧。

4.3 收入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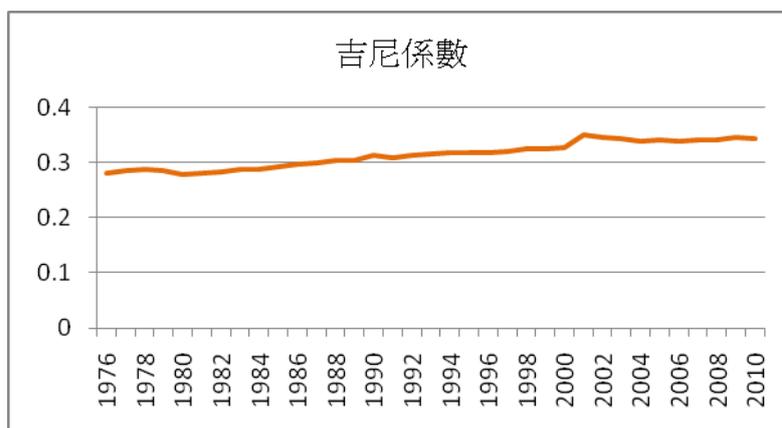
一個社會的個人薪酬差別，是應當反映個人對社會貢獻的差別。環顧世界各國，在典型的企業中，最高與最低薪酬的相比，有極大的差異。在美國，是100對1；在歐洲，是低於50對1；在日本，是不超過10對1。這樣大的差異，不可能只是反映高低薪酬員工對社會貢獻的差別，而也是反映不同社會的不同的文化與風氣。在一個奉行王道文化的社會裡，最高與最低薪酬的差別，是不應當太大的。

此外《論語·季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則更進一步點出社會所得分配的核心問題。人民擔憂的並不一定是貧困本身，而是分配的不均。圖三顯示台灣所得分配第五分位族群所得相對於第一分位族群所得的倍數，可以發現近40年來，台灣家庭所得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最高20%的家庭所得相對最低20%的家庭所得，從1976年的4倍多，逐漸增加到21世紀10年代的超過6倍。圖四顯示台灣的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也呈現同樣的趨勢。因此政府必須更加審慎地運用各種社會福利，如透過發放低收入戶生活補助、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老農福利津貼、殘障生活補助、災害急難救助，以及各項社會保險保費補助等政府轉移支付來降低所得的不均度。從更長遠的考量，政府應當加強對教育與科技研發的投資，加速產業升級與多元化，加深再就業培訓的力度，才能面對全球化與資訊通訊技術進步產生的衝擊，使人民能有充分就業的機會，從而縮小社會上的貧富差距。



圖三



圖四

4.4 協調合作創造雙贏

在傳統的市場經濟裡，各個參與者都是獨立運作，不能締造雙贏，達到正和 (positive-sum) 的結果。但在真實的世界裡，可以有很多雙贏的機會。例如一個房東和一個企業租客，他們彼此的利益看起來很不一致。房東希望長期的高租金，但也不想高到租不出去。企業租客當然希望租金較低，也希望能有一個長期的租約，但最不想見到的，就是企業剛剛開始穩定的時候，房東就大幅度提高租金，逼得它只好結業。

假如房東和企業租客都能夠看遠一點，房東給租客一個長期的租約，租金分兩部分：基本租金是固定的（或是與通貨膨脹率掛鉤），激勵租金是可變的，與企業的營業總額（超過一個預先設定的門檻以上）掛鉤，例如百分之五。這樣一來，雙方的利益都有保障，房東可以分享企業的成功，而企業租客也可以安心地長期發展。

要達到這種雙贏的結果，雙方就不能各自只考慮單方面的短期利益，也需要考慮彼此的長期利益。往往雙方必須要協調 (coordination) 與合作 (co-operation)，才能達到雙贏的結果。

5. 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

一個奉行王道文化的社會，不會讓個人利益凌駕於集體利益之上。日本人民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與2011年的福島大地震與海嘯後的表現，都是很好的例子。在大地震(和海嘯)後，災區社會秩序井然，處處可以看到日本人民在災後的應變措施以及人民彼此互相關懷，互相以全體民眾利益為優先的行為，而在其它災後城市普遍發生的劫掠事件，完全沒有發生在神戶和福島。這就是不讓個人利

益凌駕於集體利益之上的例子。

反之，美國國會議員在2011年商議應否提高美國國債上限時的表現，是一個很壞的例子。所有美國國會議員都知道，美國國債的上限，是非提高不可。但大家都希望其他的議員投贊成票，讓自己可以有空間投反對票，從而幫助自己再競選連任。結果是議案遲遲不能通過，連累到美國國債評級被下調。這就是美國國會議員讓個人的利益凌駕於集體與國家利益之上的壞例子。其實，美國國會議員當時是應當全體一致通過提高美國國債的上限。這樣既能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也避免了讓這整件事變成選舉的議題。

6. 結語

王道是儒家用之以為治國平天下的基準，以教化人民為前提。這樣的治國方式是必須由執政者自身做起。《顏淵十七》：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這就是說：上樑正下樑就不會歪的意思。因此當國家在執政者帶領之下，能以民為本，使人民溫飽之餘，思考如何教化人民，改變社會的價值觀，並輔以適當的法律，使得人民不再以個人自身利益為優先考量，而考量他人以及整體並較為長遠的利益，這乃是整個王道文化的精神所在。

假如一個經濟體中完全沒有外部性，在完善競爭的條件下，市場機制可以使整體經濟達到最高的效率（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基本定理）。可是當從生產到消費都有外部性，同時完善競爭的條件也未能滿足時，單靠市場機制自動運作，就不能保證整體經濟能夠達到最高的效率。因此在現今的經濟體系中，市場機制與政府監管，如同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必須手攜手合作才能達到最高的效率。而達到最高的效率，在實現超富足的物質經濟水平之前，是邁向大同世界的必須。

推行王道文化，首先需要移風換俗，需要從改變整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做起，改變每個個人的效用函數做起；要每一個人除了照顧自己的利益之外，也會考慮到其他人的利益與感受。光是靠立法與執法，不足以阻止不道德、不公平或不合法以及短線行爲的發生，也不能保證社會的和諧。唯有改善、重整與重建道德價值，培養社會大眾的公德心，改變個人的效用函數，才能將種種叛道、虧德、不法以及追求短線利益之行爲，消弭於無形，才能維持社會的長期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儒家經濟思想研究，中華書局。

[2] Plato，The Republic。

[3] Smith，Adam。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